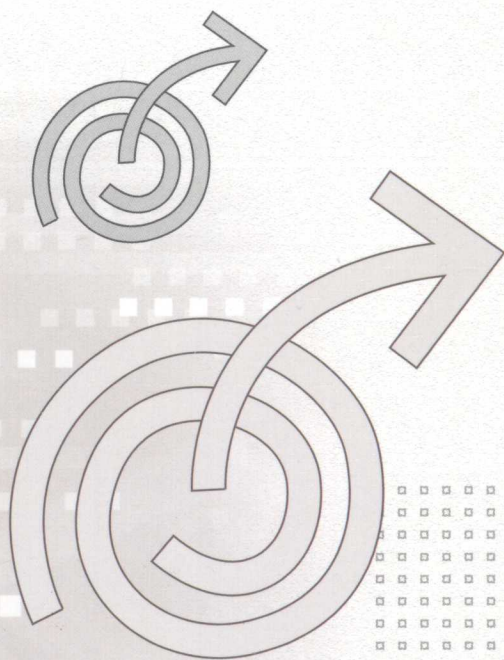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广义转化理论系列之一

ZHUANXING WENTI YU
MAKESI LAODONG JIAZHILUN TUOZHAN

转形问题与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

罗雄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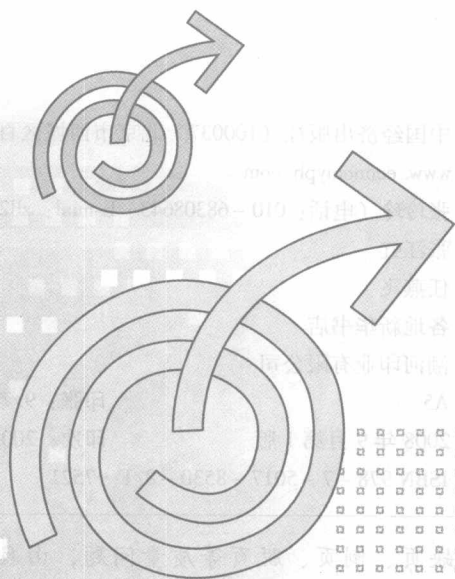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广义转化理论系列之一

ZHUANXING WENTI YU
MAKESI LAODONG JIAZHILUN TUOZHAN

转形问题与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

罗雄飞/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形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罗雄飞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017 - 8530 - 8

I. 转… II. 罗… III.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

IV. F01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72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张玲玲 (电话: 010 - 68308643 E-mail: zll2200@yahoo.com.cn)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印张: 9.75 字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530 - 8/F · 7521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摘 要] >>>

本书的研究以三大理论难题为主轴,在对这些理论难题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创新”,从而将其落实到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

第一个理论难题是“转形问题”。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有体系的科学性,为其进一步拓展确定一个方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来的 100 多年中,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否定主要是围绕“转形问题”提出来的,而“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由于“两对总量”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同时相等,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一般条件”下是不成立的。通过对“转形问题”的具体研究,本书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 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要使“两对总量”同时相等,确实需要“特殊”的条件。但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特殊条件”都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条件——总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一条件确实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化理论所要求的,并且,在这一“特殊条件”下,投入是否转化为生产价格没有实质性差异。然而,这一条件的存在确实意味着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运用了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因而存在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一般条件”下,意味着总资本有机构成不能保持不变,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即便投入资本没有变化,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必然发生量的变化,总价格和总利润也会相应变化,由此得出的总价格、总利润与比较静态条件下的总价值、总剩余价



值不可能同时相等。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只能在“特殊条件”下成立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等共同存在的问题。

2. 以生产价格计量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与以价值计算的相应成本存在差别(“误差”),但不能把这种差别引申为总价格、总利润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的“误差”,更不能把这种“误差”强加于马克思。

3. 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且没有“特殊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转化理论中所运用的平均价值利润率与运用新古典均衡分析得出的利润率确实是不一致的,用以劳动时间为计价物得出的均衡价格总计的总投入也是不确定的,这与我们“投入资本没有变化”的假定前提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两对总量”不能同时相等存在内在的关系。这种不一致是由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转形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资本计量问题”的衍生物,或者说是这一问题的幻影,由此产生的“转形问题”不但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由,而且它表明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新古典均衡分析框架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个理论难题是复杂劳动的还原和价值—价格关系的重构问题。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平均劳动”作为复杂劳动还原条件下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形式和计量手段,这是复杂劳动还原的重要基础。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相同的内涵。将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运用于比较期的商品价值衡量时,单位商品的价值具有量的确定性,它能够克服“社会必要劳动”的量的伸缩性引起的麻烦。在一定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尽管表现

为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总量上依然是一致的,能够用一定的系数进行换算。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不同的量。这种差异表现为换算系数的差异,也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本身的差异,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一样。“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是复杂劳动还原的又一基础。本书运用马克思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运用“简单平均劳动”的范畴和“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本书提出了两种复杂劳动还原的具体思路。一是以基期各部门的生产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即基期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基期各部门的“简单平均劳动”,然后根据“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以不变价格计量不同报告期的所有物量,这样可以得到不同报告期的总价格,其总价格可以通过该部门基期的价格—价值系数换算成“总价值”。二是以基期的生产价格进行还原。基本方法是:首先从所有产品中选取一种产品作为基准产品,并求出所有产品与基准产品的比价系数(比价系数求解以现行市场价格和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然后通过比价系数求新价格,再通过新价格求更新的比价系数。这种迭代到达不动点时,由此形成的各种商品的最终价格,也就是以基准商品为基准的理论价格。在此基础上,把单位基准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作为“简单平均劳动”,通过基准商品确定的价格—价值系数,其他商品的“简单平均劳动”可因此确定。确定了基期各种商品生产的“简单平均劳动”之后,不同报告期的“价值总量”可通过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方式求出。由于这一分析是在假定所有劳动为生产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必须将非生产部门的收入所体现的价值作为一种变相的利润回归到生产部门。具体方法是:第一种思路可把非生产劳动时间以一个平均的



份额加到物化产品的“简单平均劳动”中；第二种思路则可以把非生产劳动部门的收入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并通过平均利润体现到物化产品的理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其他约束条件放松的基础上，本书对价值规律在较为具体的现实经济中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交换价值相等为基础的“非等价交换”原则；具体探讨了劳动价值对价格总量和价格运行的长期趋势的约束作用，以及商品价格的市場决定问题；论证了商品价格由“价值总量”的市场化再分配确定的观点。

第三个理论难题是“资本计量问题”。所谓“资本计量问题”，其实质是指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投入资本的计量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循环论证问题：已知利润率求资本量，再通过资本量求利润率。由于琼·罗宾逊、斯拉法等运用这一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强烈质疑，由此引起了长时期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争论至今难以达成共识，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技术再转换”或“资本倒流”现象使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密度与利润率的逆向单调关系的结论及其相关的一些命题的科学性受到动摇。解决“资本计量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一种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的核心是不同“时期参数”（设备生产周期和使用寿命）条件下的利息问题，因而，只有利息的本质及其源泉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对于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都不可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理论同样受到“资本计量问题”的制约，以致不得不陷于循环论证或预设待证的结论。对此，本书在复杂劳动还原和拓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两个剑桥之争”提出的理论难题进行

了合乎自身理论逻辑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对斯拉法体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商品生产所费劳动与商品所购劳动存在矛盾。(2)“标准商品”论证存在多重潜在的循环论证,即商品价格决定与劳动对资本的比例确定的循环、“标准商品”与“标准体系”的循环、“合成商品”与生产方程的循环。摆脱这些潜在的循环论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预设待证的结论,因此,“标准商品”理论既缺乏现实基础,又缺乏逻辑的合理性。(3)由于根深蒂固的利息率观念的存在,劳动还原只有在利润率为零的空想条件下才能成立。(4)联合生产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生产的合理反映,且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初步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兼容互补关系,并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新古典经济学要解决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要树立必要的“历史观念”,要正确对待“时间价值”,都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可以为凯恩斯理论提供合理的宏观基础;(3)发展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所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是在诸多约束条件下通过科学抽象获得的对经济表象背后的本质的认识,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通过价值源泉和分配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它对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说明是原则性的、抽象的。本书通过约束条件的有序放松,使价值规律的作用落实到更为具体的



现实经济层面,揭示其较为特殊的作用方式,以及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方面的特殊规律。这种在约束条件全面放松的基础上重构的理论体系,可以称为“广义转化理论”,它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它们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它们的差异以约束条件为转移。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价值规律作用方式转化的基础上,根据商品和价格的重新定义,通过引入产权、收入分配和存量价值等因素,本书对商品的价值—价格关系进行了重构。市场价格的决定被看成是“总价值”的市场化再分配。商品价值与价格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个别商品的价格可以进一步背离乃至完全脱离自身的价值。在“价值总量”约束和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基础上,个别的、具体的和短期的商品价格决定反映着市场供求力量的对比。因此,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获得合理的存在空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居于基础性、指导性地位。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研究劳动价值理论 (代序)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以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辩证思想为基础,可进一步上溯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它看来,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它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要求以科学抽象的方法首先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最一般的规律,然后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进一步阐释一般规律或本质的特殊作用方式、表现形式以及以一般规律为基础的事物的特殊规律。现代西方经济学大体上是以英国的经验哲学为基础,强调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甚至认为经验之外的事物是不可知的,“本质”或规律是不存在的。它突出了经济人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遵循从特例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而相对忽视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市场背景的分析,或者说对市场背景偏于相对静态的分析。正因为这样,同样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严格约束条件下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这种科学抽象能够得出本质的、一般的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特例”;放松约束条件后,马克思认为得出的结论只是一般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可以



获得更为一般化的结论。

从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出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以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单纯凝结的即物化的一般人类劳动时间为价值实体,力求揭示经济运动的最一般规律——价值规律,并进而阐述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然而,它并未停留于对价值规律的静态的、简单化的描述。作为商品的价格,在简单商品经济的严格约束条件下以价值为基础,放松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假定后则以生产价格为基础。依此类推,如果放松产权约束和其他条件,价格的内涵一定会相应发生变化。产权关系得到体现后,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要售出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资本论:第3卷[M]. 人民出版社,1975:714.)。因此,商品这一范畴也可能需要重新界定。即便是价值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具体的内涵在复杂劳动还原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变化。这体现了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的哲学观点。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经济环境或约束条件的变化,经济范畴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1972:186.),经济范畴同它们所体现的关系一样,“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人民出版社,1972:327.),是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因此,不能把经济范畴“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资本论:第3卷[M]. 人民出版社,1975:17.)。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是活的体系、活的理论。它要求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经济环境中,用发展的眼光去把握基本原理的不同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从而理解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关系。

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要求首先在最纯粹的状态或最典型的环境中,通过科学实验式的研究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

关系的本质和经济运动的一般原理。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形态正是在严格约束条件下构想出来的一种理论抽象,它带有历史上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不能与任何历史阶段的简单商品经济相对应。随着约束条件的放宽和历史环境的变迁,由此揭示出来的价值规律尽管仍然起支配作用,然而其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则必然发生变化。如果不理解这种思想方法,就有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解,就会像萨缪尔森等人一样,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适用于“原始状态”。事实上,如果严格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约束条件简单化地与现实对照,即便是“原始状态”,它也是不适用的。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范畴的价值,“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资本论:第1卷[M]. 人民出版社,1975:90.),而在“原始状态”,共同体内部的交换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原始状态”的价值关系只不过是“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政治经济学批判[M]. 人民出版社,1955:167.)。正因如此,恩格斯曾经指出:“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 人民出版社,1976:573.)可见,如果不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正像不能否定自然科学家在典型的、特殊的实验室中进行科学探索的意义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严格设定的条件与现实无法一一对应,便否定其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课题。只要把握住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我们就能够确立创新、发展的方向。有些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没有什么用处,至于生产价格理论,尽管过于粗糙,依然具有合理性。这种认识很难说是基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最



基础、最一般的理论。相对而言,生产价格理论是更为特殊的理论,它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放松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对剩余价值在各部门间分配的影响可以忽略的约束条件后拓展而来的,它反映了价值规律在更为具体的环境下的某种特殊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可见,抛弃了劳动价值论,生产价格理论也就不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成为以“劳动时间”为特殊计价物的新古典经济学化的价格理论。并且,这种对生产价格理论的肯定也只能是一种历史评价,因为它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相比,显得很“粗糙”“幼稚”,没有现实意义。因此,首先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地位,才称得上是科学的态度。而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价格理论依然具有非常严格的约束条件,它是对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这样一个特定理论难题的抽象的、原则性说明,在阐述更为具体的现实经济的价格决定和其他问题时,它是有局限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生产价格理论,而是需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尽可能放松约束条件,建立起比生产价格理论更为广义的转化理论,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现实。通过复杂劳动的还原,可以将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和知识进步内生到价值形成过程中,并在社会分工的动态发展和以“劳动关系”为内核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关系条件下,揭示价值规律的特殊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产权关系和收入分配、存量价值因素,我们可以在更现实的条件下来理解商品和价格的意义,将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看成“价值总量”的市场化再分配机制。这种市场价格机制受到全社会的“价值总量”的约束,遵循着价值规律,而同时又发挥着人们的主观意志及其主观效用判断的作用。这样,供求关系可以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纳入商品的价格决定机制中,从而重构价值—价格关系。这既是均衡分析,又是非均衡的动态分析。这种超均衡动态分析完全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的动态发展的思想

方法。

如果从思想方法和分析范式的高度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批评大多是出于误解,这集中体现在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中。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对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一种理论说明,尽管这种说明是抽象的、原则性的,我们无法据此考察现实中更为具体的价格运动,但从逻辑上看还是非常严密的,不存在所谓难以克服的“转形问题”。《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庞巴维克等人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强调商品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第三卷则强调商品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且必然地、经常性地背离商品自身所含的价值。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矛盾,甚至以此宣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破产了。可以说,这种认识是出于对马克思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无知,因此对于价值规律在不同约束条件或不同经济环境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的差异,他们无法正确加以理解。此后,不少学者认为,如果将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预设的两对总量相等(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在“一般条件”下不能成立,并以此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斯蒂德曼等又指出,马克思运用生产价格理论得出的平均利润率与实际的货币利润率(均衡利润率)不能取得一致,并且,他不是以此否定生产价格理论,而是以此质疑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地位,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从分析方法方面看,这些批评同样存在严重的偏颇。他们所谓“特殊条件”,如果能透过其“模型”分析使用的特定语言把握其实质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这无非是“总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或者说是总资本保持一定的条件下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确实是两对总量同时相等的前提。在这一条件下,不仅两对总量能够同



时相等,而且投入是否转化为生产价格对马克思进行的分析丝毫没有影响。事实上,这种分析对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来说已经是足够了,所以马克思认为没有进一步将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必要。并且,这一条件也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过于“特殊”。综观所有经济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至今也还没有哪种理论是建立在比这一条件更一般的条件之上的,即便是被一些人认为约束条件非常一般的冯·诺伊曼模型,也是附加了各种商品“按照相同的、稳定的比例增长的条件”(杨玉生,价值·资本·增长[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51.)。相对于“特殊条件”,“一般条件”自然是指总资本有机构成不能保持不变。试想,即便是在总资本一定的前提下,如果总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变化,依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总价值和总剩余价值一定会发生变化,与此相应的总生产价格和总利润也必定发生共时性变化,这时,如果要使总生产价格和总利润与总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前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同时相等,这又怎么可能?其不能同时成立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一般条件”下两对总量不能同时相等这样一个命题,可以说是历经100多年的一个伪命题。这里涉及转化理论的动态化问题。如果我们把握住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特殊条件”与“一般条件”下的理论差异是不难理清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这些观点是以“特殊条件”可还原为“总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为基础的,只要这一基本判断经得住检验,整个逻辑推论应该说是合理的。因此,这是可以检验的。如果有学者对百年争论的“世纪难题”感到不会如此简单的话,不妨暂且抛开已经形成的思维惯性,对“特殊条件”进行重新检验。至于以价值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与实际的货币利润率(均衡率)的差异,罗宾逊早在斯蒂德曼之前就认识到了。她指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不是一个均衡率或资本的一

个供给价格”(乔安·罗宾逊.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 商务印书馆, 1962:13.),但她没有以此否定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而是认为马克思的转化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根据这个理论自己的假设是无可击的”。(琼·罗宾逊. 经济学论文集[M]. 商务印书馆,1984:25.)她对“转形问题”的争论也不以为然,认为批评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的肤浅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者被“拖入诡辩中去”,从而帮了批评者的大忙。(乔安·罗宾逊. 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M]. 商务印书馆,1963:20.)这也许是因为她认识到了两种利润率背后的分析范式的差异的缘故。平均的价值利润率是以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方式得出的,均衡的货币利润率则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计量问题”无法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它所对应的资本量是不确定的,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种差异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不能以此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在新古典均衡分析条件下,利润率和投入资本量不能单独确定,以此检验马克思的转化理论,必然会受到“资本计量问题”的困扰。这样,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差异来看,“转形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本计量问题”的衍生物。以上分析表明,所谓“转形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缺陷,它只是表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尚没有超越其设定的“特殊条件”,因此在“一般条件”下无法运用其分析方法检验、评判马克思的转化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要更为充分地解释较为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需要发展,需要体系创新。并且,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这种发展、创新必须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路径。任何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视为“特例”的做法,都有违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所注重的是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和长期分析,具有动态化的内在条件。这样一种理论难以被纳入以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分析为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任何理论框架中。因此,具有这种倾向的西方马克思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西方经济学化,其分析手段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不能简单地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接轨”。相反,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创新,可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提供一种基础性价值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和供求分析可以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内寻找到合理的逻辑接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能够以“劳动时间”为单一资本要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提供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从而克服新古典经济学因价格相对性无法进行确切的资本计量的重大理论缺陷。

罗雄飞

2008年3月写于南昌动忍斋